

信用管理,不能让公众一头雾水

本报评论员 林琳

为。报道同时指出,时下的信用管理及对失信行为的界定呈现“箩筐化”的趋势,不时受到质疑。

无论是做人、做企业,还是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时时面临着诚信、守约的问题。尤其对于个人,诚信堪称安身立命之本,不讲诚信的人,可能处处受阻、时时受限。

但现实中,信用管理出现不少问题和争议。正如上述报道中说,信用惩戒出现了泛化、“箩筐化”的趋势,一些地方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往这个筐里装,欠物业费、闯红灯、对父母是否孝顺、是否参与了献血,等等,有些是“减分项”,有些是“加分项”。

一旦信用惩戒成了“筐”,那么这“筐”由谁装、装什么、怎么装、装错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导致人们一提起信用管理、征信档案,往往一头雾水、一脸懵。

目前,国内存在两套信用系统,一套是央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通俗的“征信”,与人们的信用卡逾期等经济行为相关;另一套是国家发改委主导的社会信用系统,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联,比如霸座、献血等。

但普通百姓能搞清两者的区别吗? 有贷款忘了还,是征信有问题还是诚信有问题?

在旅游景点有不文明行为、没有执行垃圾分类,会被记入征信档案还是信用档案? 时下流行的“联合惩戒”,究竟是跟哪个系统联合、挂钩?

严重的是,相关地方和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也是“傻傻分不清”。同一件事情,有的地方纳入了征信范畴,有的地方列入信用行为;一些文件、规定中,涉及信用的表述,也多不统一。

概念都没搞清,落实起来自然稀里糊涂——张三认为应该往这个筐里扔,李四觉得应该往那个筐里扔;王五想装胡萝卜、土豆,赵六想装西红柿、鸡蛋;今天放进去,明天又拿出来……

必须明确的是,信用惩戒管理不是相关部门自娱自乐的游戏项目,它是深切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十分严肃的社会管理。

信用记录有问题,买房、贷款可能受限,找工作、评职称、评优评先可能被暂缓;除了减分项、不良记录,一些地方还设置了诸如“无偿献血”等加分项、奖励项,这也意味着一些人明明没做错什么,但信用分就“低人一等”了,这引发人们对其公平性的质疑。还有,不少行为已纳入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如果再挂钩信用,是否意味着二次处罚? 此外,相

关人员可能疏忽大意,把给张三的惩戒放到了李四的记录里,或者无中生有,给明明没有信用卡的人作了“逾期未还”的不良记录,而被记录的人纠正起来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甚至更久……

人们到底应该有几份信用档案里面应该记录哪些项目? 失信的记录会跟随人们多久? 如果出现问题,如何补救、修复? 公众的建议、意见如何被倾听? 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权威、科学的答案,不能稀里糊涂。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社会信用立法提交了议案提案。亦有报道显示,社会信用立法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近年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涉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法规、规章和政策,一些地方人大和政府也颁布了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诸如互联网、大数据、5G技术等信息基础设施相对成熟。这些都为一部统一、权威的社会信用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用高层级的立法终结时下信用管理的混乱和无序,人们期待,相关工作抓紧提速。

现场·我在我思

方大丰

“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这句话,湖南长沙芙蓉区定王台街道丰泉古井社区书记龙欣反复说了多次,以表达对政府推动老旧小区“有机更新”的赞许。

这是居民的真感受,也是政府的新理念。

在长沙方言里,老长沙人被称为老口子,龙欣就是一个老口子。她提到,“位于白果园片区登隆街里的长沙剧院,那是我母亲年轻时听过越剧的地方,这个剧院还在。我的公公现在还管登隆街叫‘亮壳子’……”

我说,这句话触动了我,我要原封不动写进稿子中。

长沙老口子管灯笼叫“亮壳子”——龙欣的讲述,也点亮了我心中对此行采访“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的“亮壳子”。从山高水远的大湘西,一路走到车水马龙的红网城市长沙,所见所闻,不都是“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的各种样本吗?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包括,“老乡”的意见和感受是检验小康生活成色的重要指标。

小康不是画饼,更不会从天而降。小康生活就是老百姓充满生命体验的全过程,不应该也不会是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刻板形态。譬如老旧小区“有机更新”,既是对老房旧宅的智慧改造,让居住功能与城市环境同步提质,也因刻意保留一座城市的记忆而使得治理充满了人文情怀。

城市和乡村一样,都是有记忆的,留住记忆,就是留住了百姓的“乡愁”,会让生长于斯的人民平添可持续的幸福感。我以为,长沙能连续13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也是生动的注释——民众的小康生活,“心有所安”最可贵。

在采访现场,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人声鼎沸的长沙网红打卡地“超级文和友”,与风景如画的张家界龙尾巴村,小康生活的密码如出一辙:更加注重“新与老”的衔接,更加注重生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衔接,更加注重决策意志与百姓诉求的衔接……让“幸福来敲门”,老百姓不仅感受到了“幸福”在家门口的升级,而且觉得不折腾、不矫情。

湘西十八洞村是藏在大山深谷的一个苗寨,“精准扶贫”在这里首次提出,我们来到这里,除了惊叹山川之秀丽,也会因为苗家大妈结账时伸过来的二维码,而拉近了距离。

生活与生存的要素、条件,不再因为隔着万水千山而有显著的差距和不同。

因此,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娇娇”会回到这里做“直播”;清冽甘甜的山泉水,会“流”向大都市的超市货架……小康不是乌托邦,是每一个个体生活水平、生存体验的升级——很可能,我们矢志追求的小康目标,就是创造更优良、更平等的环境和条件,让每一个个体更充分地分享资源,让每一个家庭更公平公正地分享发展的机会,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洒落温暖的阳光。

“分享”让生活变得更容易。撤掉架在人们头上观察远方的望远镜,我们会更懂得托尔斯泰所谓“有生活的时候就有幸福”不无道理。

自古以来,小康就是升斗小民对殷实、安定生活很具体的期待。科技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康”愿景,但即使在今天,“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仍然是小康最本质的场景——小康目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生活,人们永远期待,生活足够安宁、祥和、踏实和充满人情。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许包含着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归根结底,我们所要致力的,是消除障碍,破除藩篱,填平鸿沟,创造条件……让“幸福来敲门”——就像我们在龙尾巴村看到的那样,因为“让旅游资源深度融入”,如画的风景区闯进了百姓的生活里。

G图说



斑马线的“考验”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浙江苍南县一名干部因累计3次未礼让斑马线,失去了年度考核评优评先的资格。据悉,当地在“八小时”外干部延伸管理方面,完善了干部负面信息管理机制,增加了包含礼让斑马线等公序良俗类负面信息统计,以智能化手段为选人用人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礼让斑马线是文明行车的要求,也是交通法规规定的驾驶人的义务,党员干部理应带头示范。同时,干部选拔任用本就应该尚贤重德。将干部“八小时”外的言行举止纳入文明考核,看起来有些“管得宽”,实际上是“用人唯贤”。某种角度上说,斑马线是考验干部文明状态的“刻度”,只有将个人修养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可能从内而外地成为合格公仆。

赵春青/图 嘉潮/文

【新时代人才观见证社会的开放、包容与多元】

新闻——

最近,两个新闻事件引发了人才观念的热烈讨论——一个是“口红一哥”李佳琦以特殊人才身份落户上海;另一个是原籍安徽阜阳的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不仅在杭州购买首套房可获得100万元补贴,还能在医疗保健、子女就学、车辆上牌等方面享受照顾。

刘能

这两个新闻的焦点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在重新界定其关于人才的标准。

这类新闻在发生着快速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冲击着人们关于人才、成功的固有理念。

比如,人社部近年来定期发布新的职业类型,最新的一期涉及9个新型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在电子竞技作为一种新型体育项目成功踏入国际赛事顶峰之后,原先家长老师眼中迷恋网络游戏的个别少男少女,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新行业从业者。更不用说互联网经济造就了无数的直播网红、网络作家和网婆主(指在特定网站上传媒介内容供社群成员下载、观看和传播的个人用户)。在互联网流量经济的吸纳、运作和包装下,这些直播网红、网络作家和网婆主都有成为新的“富裕起来的一群人”的可能性。

在劳动力市场中转变自己的身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一。最开始,个体户成了解决持续积累的失业困境的新出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现金收入,成群的年轻打工仔使得

深圳等经济特区拥有远低于其他传统工商业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龄;国有经济体系中的“铁饭碗”被打破,人们目睹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海”潮和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潮。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40年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一个拥有高等学历的白领中产阶层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产权的多元化推动了私营经济的日益活跃,最终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大愿景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在一个可预计的人生当中,对于劳动力的社会需求、社会期待和评价标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当是一个持续的长时段趋势。

因此,职业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对当代中国发生着的结构性社会变迁的快速回应。当新的职业类别或职业身份的经济回报在互联网时代广为传播时,新的评价标准也随之产生,并影响到家长对孩子未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选择。

比如,当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成为视线焦点时,很多家长开始训练自己的幼年孩子;当各类特长成为高考加分项目时,很多家长跟着自己的孩子转战于各个竞赛赛场;当扮演教师的9岁男孩钟美美获得成功的时候,可以猜测,很多家长会开始学习如何拍摄短视频,争相成为展示自己孩子才艺的“网婆主”。

社会有了新的需求,让家庭认识到某种才

能的市场价值,从而加大投资,使之成为家庭成员未来的高回报的新职业技能。而整个社会正在重新定义成功的概念,当爱好可以成为高回报的职业技能,那么我们也许会在面对高考竞争的独木桥时少一份焦虑,多一份理解和宽慰——说不定自家孩子不必靠朝九晚五的枯燥工作来谋生,说不定还能因此出人头地。

职业领域的新变化就像当年瓦解“铁饭碗”思维的改革浪潮一样,冲击着人们关于人生可能性的有限想象力,提升着人们对于个性化的天赋和能力的尊重和正视,也逐步消减着人们关于成功的固定思维。

与家庭、传统教育机构相比,地方政府看起来更能理解这些变化背后潜藏的多种可能性,掌握了更多经济数据和经济信息的地方政府反应也更快,希望这种领先反应能够慢慢影响到家庭和教育机构。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未来应该参考孩子未来所处社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期待来加以规划;孩子的爱好以及支撑这些爱好的天赋和能力也许将成为奠定孩子未来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基石。对于传统教育机构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去激发每一个受教育者发现自己特有的素质和潜能,并给予这些素质和潜能一个成长壮大的良好规划,而不是以一个固化的模式来刻画它们。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社会学系副主任)

人才标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和“记录仪”

田丰

这两件事引发社会关注和思考: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究竟什么样的人算人才? 现代中国社会的人才标准有什么样的变化及影响?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标准都有着特定时代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比如,唯文凭论。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匮乏,急需一批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栋梁。现实中,大批有能力、有才华的专业技术人员受阻于条条框框、论资排辈的限制,难以出头,文凭成为挖掘、评价、使用人才的重要标准。文凭作为一个简单判断工具,能在特殊时刻解燃眉之急,而随后的发展却成了社会进步的某种障碍,有才能、有技术却没学历、没文凭的人往往被排斥在人才队伍之外,甚至一些用人单位将文凭和学历奉为圭臬。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思想上、行动上的惰性,以文凭和学历作为筛选人才的门槛是最省时省力的操作,但并不是科学、严谨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方法。

再如,唯“海归”论。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体系,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海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不断被引入国内,一些学成归国的海外学子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时间,“海归”成为人才的代名词,但凡是留学归来,无论

真实能力如何,都能得到重用。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科研技术人员总是“高人一等”的局面,至今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甚至仍然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衡量、评价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两种人才标准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全面挖掘、评价和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对人才的判定不应该拘泥于某种特定条条框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应该确立什么样的人才标准。

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有几种视角可以借鉴。

第一种视角是功能性视角,就是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一些职业群体是社会运转所不能或缺的,他们对保障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即便有一些职业群体看上去微不足道。最典型的是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前者维护着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后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城市“红细胞”。这些看似底层的职业群体在常规标准中被认定为人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是社会欠他们的一个公道。

第二种视角是贡献论,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看哪些职业群体做的贡献最大。不少人认为,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提升,被评定为各类人才的比例也比较高。李佳琦之所以能被上海当作特殊人才引进,不仅是他的职业属性,还有其作为公司大股东的影响。但现实中,有一些贡献很大却被忽略的职业群体,比如教师,他们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重任,但是因为